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

——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吴景平

[摘要]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1938年 国民党 对日和战态度 蒋介石日记

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问世的诸多论著,均涉及到这个问题。^①整体看来,研究者们较多关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对日态度的转变,^②而对中日战事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和战态度较为深入的研究,见有以中日德关系及陶德曼调停为个案的论著,^③也有对较长时间国民党的抗战立场表述的论著。^④近年来,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开放,通过该日记来研究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成果,得到学界的关注。^⑤海内外陆续开放、公布和出版的多种名人日记,提供了战时官方文书之外的另一种重要史料,它不仅可以补充一些重要叙事的不足,更记述了有关人物自身和相关人士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态度乃至心路历程。笔者梳理了以蒋介石日记为主的数种战时日记,^⑥适当结合其他类别史料,认为自陶德曼调停失败至1938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具体态度不尽相同,情况颇为复杂。1938年1月的陶德曼调停失败后,虽然中日双方都公开表示了强硬的立场,但就整体而言,国民党的和战态度并没有真正解决。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总裁,可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之间,依然有重大分歧。在国际社会无法有效制止日本侵略、不能积极援助中国抵抗的背景下,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接连遭遇重大失利,战

① 这方面的著作较多,如: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有关的论文见有:刘维开:《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近代中国》第118期,1997年4月;王建朗:《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③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版;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④ 可参见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31日),该文述及抗战爆发之后诸多重要关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但是缺乏对其立场的曲折反复的分析以及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比较。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第一章,在叙述自卢沟桥事变到汪精卫集团投敌期间战局演变过程中,多处述及国民政府的抗日立场,如1938年1月日本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事实上,日本此项政策确实使国民政府对中日媾和的前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以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显示了它的决心。”(第64-65页)1938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力图使中国中央政府崩溃的政策,“除了促使国民政府更加坚定地抗日外,并无其他作用。”(第65页)1938年11月南岳会议期间“蒋介石反复表达的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被此后的实践所证明,尽管他也有过动摇与游移。”(第90页)1939年1月蒋介石颁布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表明“他对靠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并不自信,这和他一面坚持抗战、一面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以解决中国问题的‘苦撑待变’思想是一致的。”(第97页)

⑤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 主要有《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张嘉璈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原件);《王世杰日记》(手稿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陈布雷日记》(东南印务出版社刊印本);《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等。

局前景十分严峻:在日本交互使用军事逼降和政治诱和手段之下,国民党内部的和战抉择颇为曲折,时有反复。直至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出走,抵抗与拒降才成为国民党内难以撼动的基本方针。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处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1938年1月初,即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关系破局前夕,国民党高层对于是否接受日方条件的分歧公开化,蒋介石自认可以对“汪阎与白刘王和战二派”,进行“调剂与运用,表里互用”,应对日本方面的逼迫。^① 蒋介石本人一方面对日方逼和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晚接倭寇条件,即严词拒绝”。^② 另一方面,蒋介石一度仍以为“对德大使所传消息,倭寇求和之意甚切乎?”^③“倭寇求和甚切”。^④ 至于国际组织能否出面干涉、有效制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战争,经过1937年10月的国联大会和11月布鲁塞尔会议,蒋介石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可以说,蒋介石认为中国应以持久抗战的决心,包括不接受名和实降的停战条件,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的积极反应。

笔者见到的其他名人日记,亦可说明当时国民党高层在时局判断与和战态度的复杂情况。如1938年1月3日陈布雷便有如下记载:“八时卅分渡江至中央银行参加第四十次常会,顾大使有长电来,剖析国外情形,断言国际形势无可利赖,谓德、意劝我和平,英、苏勸我抗战,均是各为其私,所言极沉痛。席上交换关于外交意见甚多,无结论。”^⑥而1月5日王世杰在同一天日记中提到孔祥熙时,既认为孔“对大局似甚悲观”,又记载其“坚以共赴国难为言”。^⑦ 他还记载了蒋介石向政府要员表示过主战的态度:“闻蒋先生近日与阎锡山及其他政府中人商谈,仍主继续抗战,而以川、滇、黔为最后根据地。日方以所提媾和办法与条件(即德使转来之条款,见前)未被我方接受,其内閣中陆、海、外及总理四相会议后,又发表官式声

明,将继续向中国作军事压迫。”^⑧

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国方面须于1月15日前作出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天,中国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递交了正式答复:“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提出,中方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愿,会被日本认为是在搪塞。王宠惠答称: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出决定,也不能表示意见。^⑨ 王宠惠的答复究竟表明了什么?实际上既没有接受但也没有明确拒绝日方的条件,不宜做更多的解读,因为当时国民政府高层尚未经过决策程序。据有关当事人的日记,1月14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商议过如何应对日方的逼和。如陈布雷当日所记:“九时到中央银行参加第四十三次常会。王外长报告德使转来消息,知敌方以十五日为期限,欲胁我屈服。席间汪、孔、张发言甚多,汪所言大意可以‘战无把握和无保障’(即谓敌方不守信义且贪欲无厌)八字概括之。”^⑩ 陈布雷只提到汪精卫对和战问题的悲观看法,而翁文灏所记虽然更简洁,但对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和战取舍的记述,却更为明确:“国防最高会议开会,到者汪、张、孔、王、陈、何、于、居、邵、陈、翁。汪、孔、张、何、王讨论中日大局,多主和。”^⑪ 据笔者所见诸人日记,蒋介石没有参加1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以下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不再一一注出。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7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9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0日。

⑥ 《陈布雷日记》第二册,东南印务出版社刊印本,第257页。

⑦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5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60-161页。

⑧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8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第162页。

⑨ 《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1938年1月1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7-48页。

⑩ 《陈布雷日记》,1938年1月14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59页。

⑪ 《翁文灏日记》,1938年1月14日,《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3页。

月14日的第43次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但同一天蒋介石充分考虑了对于拒绝日方条件可能导致的严峻后果：“注意 一、倭寇之反响如何，甲、宣战，乙、否认，丙、威逼强求，限期答复，丁、不再复，戊、再行续议。”^①然而，蒋介石最终决定明确拒绝日本的逼降条件。1月16日，蒋介石明确指示外交当局“对德大使明言，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②这就使得德国方面当时无法继续在中日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

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遂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③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政府公开对国民政府表示的最严厉的声明。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感到更多的压力，他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政府昨日宣布不与国民政府作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不仅如此，反而觉得有助于“安内”：“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而陈布雷同一天日记记载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情况：“八时卅分起。到中央银行参加第四十四次常会，王外长报告许大使来电多件。敌方声明书昨午发表，大致谓日政府于南京失陷后与国府以最后反省机会，迄今国府不解日本真意，仍策动抗战，内不恤人民之涂炭，外不顾东亚之和平，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真能与日提携之新政府之成立与发展，与之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更生之新中国。日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强在华权益之方针，毫无变更，现在日本对东亚和平之责任愈重，切望国民更为发奋，实行此项重大任务云。并闻敌已召还川越，通电各驻外使馆，声明与国府外交关系业已停止云。讨论许久，决定由外交部起草一声明书。——夜整理积件，九时渡江，往汉口与汪、孔、张、王、徐讨论对日声明书之内容，至十一时定稿。”^⑤1月18日，蒋介石自河南视察回到武汉，陈布雷“即往官邸晋谒。核定国府声明书稿，以电话告徐次长发表之。”^⑥可以认为，正是蒋介石决定并指令外交当局拒绝日本的“苛刻原则”，使得国民党高层的“主和者”暂时断念，“内部”得到暂时的稳定，并且为国民政府的声明定了基调，且予以最后核定。

于是，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驳斥日本对华政策，并且声明：“（一）中国政府虽始终极愿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不能接受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条件。（二）一切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之傀儡组织，当然无效。”^⑦这场由德国居间调停的中日之间的“议和”画上了句号。不仅如此，1月20日，日本调回其驻华大使川越茂，中国遂亦调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两国的殊死较量，已经显现出长期化的趋向。

以陶德曼调停代表的为中日之间议和之门关闭之后，国民党高层对抗战前途并未形成真正共识，在和战抉择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真正解决。

蒋介石当时表现的态度颇为积极和坚定。据王世杰记载，1月26日蒋对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发表谈话：“蒋谓长江方面作战军力虽经京沪之大损失，至本月底，整理补充约可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七；晋方兵力经过近来两月来之整理补充，已恢复原来力量十分之八，如果经过两月，均可完全恢复，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将无法夺取武汉。彼劝中央同人，对军事前途抱乐观态度。关于外交，蒋谓彼决不签订丧权辱国之和约，现时绝无与日秘密议和之事。”^⑧同样根据王世杰的记载，在1月28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席间，孔院长庸之对大局前途表示悲观”。^⑨而陈布雷根据平时观察得出的判断是：“委员长近日励精图治之意更切，命注意政治、经济及党务改革，余深惧衰庸无以副其望也。”^⑩蒋介石还指示陈改定“抵御外侮与复兴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4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6日。

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62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7日。

⑤ 《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59—260页。汪、孔、张、王、徐，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和外交部次长徐谟。

⑥ 《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0页。

⑦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18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166—167页。

⑧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6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170—171页。

⑨ 《王世杰日记》，1938年1月28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171页。

⑩ 《陈布雷日记》，1938年1月23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0页。

民族之讲稿,拟付发表”。^①

从陶德曼调停中止到同年3月底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前后,蒋介石日记对国际局势和中日和战问题的记述更多。

2月2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关于中日战事的决议案,其中完全不提及对于侵华的谴责,遑论制裁,只是笼统地说:“深信行政院中对远东形势特别关注的各会员国,必将不失时机地与利害相同的大国进行磋商,进一步采取步骤,俾使远东冲突获得公正解决。”^②对此决议案中国方面非常不满,蒋介石的判断便是“国际形势(如此次国联对华之决议案)恶劣已至极点”。^③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蒋介石也有进一步的看法。

与陶德曼调停期间德方基本恪守中立不同,2月20日德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决定承认伪满洲国。德国的这明显倒向亲日一举措,无疑极大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气焰,引起国民党高层很大的震动。陈布雷便有如下记载:“闻德国竟承认伪满,此为外交形势上一大变迁。吾国今后之应付愈艰矣。”^④闻德大使已来见,不过解释其承认伪满为不满意国际联盟以及中德邦交丝毫不变更而已。”^⑤十时举行国防最高会议第七次全会,出席者二十余人。外、军、财三部,均有详尽报告,讨论德国承认伪满事。汪、邵、朱、孔、王(雪艇)等均有意见发表。委员长作结论,决定外交方针不变更,仍尊重国联,一时四十分始散会。”^⑥蒋介石除了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出“外交方针不变更”的决定外,在日记中谈到:“(2月22日)下午德国大使来说德国仍维持旧日邦交之意。……本日以内政、外交形势险恶为虑,唯有抗战到底而已。”^⑦可以认为,即便德国在政治上公开站在日本一边,对于中国外交造成了重大压力,蒋介石的决心与表态,对于稳住高层阵脚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除了外交领域之外,蒋介石当时“励精图治之意更切”和“注意政治、经济及党务改革”,则是其“抗战到底”立场的另一重要体现。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蒋介石在确定国民政府对日声明基本原则的同时,1月18日已经在考虑设立“民意代表机关”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日期”。^⑧在1月23日的日记中,他明确提及要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的设想,如“改称党名”、“收容新党员”,并与高层人士“商议改组本党方针”。^⑨1月30日,

蒋介石写到“改造本党”的四方面内容:“甲、容纳各派组成大党;乙、职业团体,产业与劳工团体,文化团体,准予公开组织,但由政府领导;丙、民意机关之产生;丁、经济政策之研究。”同日,蒋介石与高层人士“商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⑩2月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了“全国人民抗倭行动纲要——内政外交整个计划之方针与办法”,^⑪这个纲要,当为日后正式定名的《抗战救国纲领》。据陈布雷记载,在《抗战救国纲领》成文和定稿过程中,蒋介石确立了“纲领之主旨”,^⑫张群与陈公博曾参与修改,陈布雷与周佛海共同审阅,最后呈交蒋介石。^⑬

另一方面,蒋介石关注着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将涉及的“党政问题”,具体又包括两大方面:“甲、党务改制与对共问题;乙、国府改选与政府五院制存废之利弊。”^⑭他甚至考虑过实施战时体制,主要包括:五院院长停止职权之行使,任为最高会议之委员;政府有紧急处分权;最高会议以命令为便宜之处置;议长有最后决定权;党政领袖制;各党最高领袖。最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议时,“彼实不愿有党魁也。”^⑮但是蒋介石对于设立国民党总裁以及他本人是否应出任总裁,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之外,在其日记中还体现出从抗日全局出发的考虑。如:“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决心与敌以精神打击。……本日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案多主张

① 《陈布雷日记》,1938年1月24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1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4日。

④ 《陈布雷日记》,1938年2月21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6页。

⑤ 《陈布雷日记》,1938年2月22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6页。

⑥ 《陈布雷日记》,1938年2月23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66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3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18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3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30日。

⑪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3日。

⑫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7日。

⑬ 《陈布雷日记》,1938年3月31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72页。

⑭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4日。

⑮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1日。

确定总裁制,为抗战与党国计则有利益,为个人则有损也。”^①(4月1日)本晚大会推余为总裁,诚惶惭愧,明知责任重大,然不敢谦辞也。……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②同一天陈布雷日记中也写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设总裁、副总裁,一致选任蒋、汪二先生担任,由吴稚晖先生登台说明,词意沈挚,全场感动。继通过抗战时期纲领及大会宣言”。^③

一般言之,主张实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领袖制,与专制和个人独裁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笔者不作简单的结论;但在日本军事压力空前急迫、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的危局下,恰恰是不愿妥协投降、愿意承担“抗战到底”后果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体现。

然而,历史现象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有些甚至是十分矛盾的。就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其本人在对日“战乎和平”抉择上的想法:

(3月22日)“言和条件,如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昔之不能解决之东北问题,以其政府不使掌握军队,若果当时解决,则仍不能免于一战,于我国地位更坏也。”

(3月23日)“如效果有和平诚意,若无致命伤之条件,以仅解决满洲问题为限,则不惜与之言和。然未到其时也。”

(3月24日)“此时将到可和可战时期,不难转入主动地位。戒之慎之,勿失战机。”

(3月28日)“倭寇制造南方伪组织,将为终止军事行动之预备乎?观乎鲁南倭寇之战也,实呈强弩之末之象,断定倭寇不敢再进矣。……视察沿路人民生活与行动之幼稚及军人精神与行动之散漫,时起不能久战之意。”

(3月29日)“倭对求和问题又停顿,其故不明,或待津浦路战事之解决乎?”

(3月30日)“宁使民心悲壮而牺牲,毋使民气消沉而屈服。”

(4月2日)“倭寇上月杪不能打通津浦线,或将变计,军事至今险恶时期已过其半乎?……台儿庄战局已呈胶着之象,甚可虑也。”

(4月5日)“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

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

(4月9日)“对倭和战方针,……准备大战。……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与汪、张谈对倭策略。”

上述反反复复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想法,正是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与政治方面进行复杂较量的体现。从军事上看,当时正值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事上取得了以台儿庄战役为代表的重大胜利。从政治上来看,抗战爆发后不久已经形成的“低调”派中的骨干分子—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到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1938年2、3月间,已经在与日本方面频频接触,并且把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周佛海。蒋介石本人也知道高宗武在与日本方面接触,甚至也做过指示。^④这一点,除了日方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外,蒋介石日记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⑤可见,结合战局进展状况和其他资讯,对于来自高宗武的有明确导向性报告,蒋介石主要解读为日本急于与重庆政府休战议和。至于如何应对,蒋介石在稍后的日记中提到“对倭和战方针”之时,既写到要“准备大战”,又指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并且“与汪(精卫)张(群)谈对倭策略”。^⑥可以认为,当时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决策层都认为,以津浦线为主要区域的徐州会战的有利态势,已经挫败日军自攻占南京以来的新一轮军事战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势在较有利的条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29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日。

③ 《陈布雷日记》,1938年4月1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73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69—70页。根据该书,是汪精卫提出应让蒋介石知道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遂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把影佐的两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另据[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日本东京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1938年4月高宗武在香港向日方转述了蒋介石的如下态度:原则上可承认日本对中国作战之两个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希望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5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9日。

件下实现停战乃至达成和局。

二

从1938年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到同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中国正面战场遭受到又一轮重大挫折,正面战场主要战线不得不继1937年底之后再次大幅度的西撤。从日本方面来看,在加大对华军事压力以冀直接逼降的同时,还频频对国民政府内部的关键性人物开展诱和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高层对于和战态度的重大反复。

原先蒋介石对于德、意两国出面协调解决中日关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对于英美方面的调停介入,一度也持消极态度:“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政策不变更,故英美空言调和决无效果。”^①“英国欲以德意问题与远东问题同时解决,于我殊为不利。”^②但是,当4月初面见高宗武之后,蒋介石认为日本急于求和以便实施北进攻俄。于是重新考虑通过英国来调解中日冲突。4月中旬,蒋介石曾经有过一个方案,即国民政府委派高层官员出任驻英大使,在英国进行此事。他甚至已经考虑到了新的驻英大使人选—张群,在连续四天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派(张)岳军赴欧任英使,派(宋)子文任不驻国大使,任孙(科)为俄使。”^③“岳军、子文赴欧之使命”,^④“岳军之使命与(郭)复初之调回”,^⑤“中倭和平交涉,以在英国进行为便,使英从中安心斡旋与保障,故决派岳军使英。”^⑥蒋认为,他这是在探寻“和平进行之路”。^⑦而当时张群本人也是把“英国出面调解”作为中日实现和平的必要前提的。^⑧以后张群还表示过:“英大使来调解时,不宜拒绝。”^⑨

到了5月份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并且发出若干对华议和的言论之后,同时德国在停止军事物资运华、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问题上执意亲日疏华,蒋介石进一步考虑“应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⑩在6月3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两点:“一、军事前途今后(第二期抗战)之决战地域将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以北(豫南皖北),至于开封、郑州等地,以在大平原中将不固守,免受无益之牺牲。蒋先生并谓武汉可固守。二、德意既已决定联日,在势已无可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⑪嗣后他还认为“倭寇求和甚急,此时应刚柔得宜,方不失机,言论尤应慎重。”^⑫“对英

美俄法应积极运用,美国反倭之形势日加矣。”^⑬当时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也一度看好宇垣出任外相后中日议和的前景。据翁文灏记载:“孔寓晚餐。张岳军论日本宇垣任外相之意义。此君在日资望极高,前次拟任首相时,拟与中国言和,但须中国反俄随日。”^⑭而此前一直与董道宁、高宗武保持联系的“低调”分子周佛海也写道:“饭后,与希圣略谈外交动向。德使陶德曼又拟劝和,而宇垣复发表松动谈话,和平尚有一微弱曙光也。”^⑮这也看出,当时中国方面密切关注着日本政局与重要人士变动,期盼日本能够自行调整其对华政策,而对于中国自身“以战致和”的实力明显不抱希望。

不过,对于英美等国出面调停的乐观没有持续多久。当时王世杰已经有较清新的认识:“目前英国能否调停尚属问题,即令出面调停,亦决不能成功。因英、法、美等国既无共同压迫日本决意,日方条件决非我方所能接受。”^⑯而当英国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等问题上显示出不顾中国权益而对日妥协的倾向后,蒋介石进一步意识到英国出面调停寄予全部寄望是不可靠的,决定:“令郭使通知英政府,若无英国参加调停则中国必不与倭言和,英国更应负责使中倭战争早日停止。如倭向英妥协,必以英国整个政策与之谈判也。”^⑰进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9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2月23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5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6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7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18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26日。

⑧ “本日,岳军谈须在英国出面调解及中日双方均知难而退之条件,和平始有可能。”周佛海日记1938年4月29日,《周佛海日记全编》上册,第118页。

⑨ 《翁文灏日记》,1938年7月1日,《翁文灏日记》,第250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8日。

⑪ 《王世杰日记》,1938年6月3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273—274页。

⑫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8日。

⑬ 《翁文灏日记》,1938年5月27日,《翁文灏日记》,第240页。

⑭ 《周佛海日记》,1938年6月20日,《周佛海日记全编》上册,第136—137页。

⑮ 《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2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300—301页。

⑯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8日。

而得出结论：“对英外交方针勿使其与倭妥协以牺牲中国。”^①按照蒋介石本人的说法，这个时候他依然希望西方大国介入中日停战议和的问题，旨在“严防敌军停战后背约失信，故必欲使第三国参加调解，或召集国际会议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也。”^②

再来看看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对于中日直接议和的态度。

如前所述，关于高宗武与日方有接触一事，蒋介石是知晓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约见高宗武近一个小时。^③第二天，蒋再次约见高。^④只是这两次约谈的内容，陈布雷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启程，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日本横滨的。^⑤但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的日记提到：“高宗武行踪与处置。”7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况报告送抵重庆后，由周佛海送呈蒋介石，其内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来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记中写到：“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倭阍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安有关系也。”^⑥7月25日，蒋介石“与汪谈高宗武报告内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岂果有愧怍之心乎？”^⑦总之蒋介石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结果十分不满，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动经费。而“低调”集团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与日方秘密接洽，谋划汪精卫出走。

蒋介石还制止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自行与日方接洽和议。1938年5月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向新设立的五相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方针的建议，再次向中国政府伸出招降之手。宇垣主持外交，曾引起国民党高层的高度关注。据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5月27日的日记记载：“孔寓晚餐。张岳军论日本宇垣任外相之意义。此君在日望极，前次拟任首相时，拟与中国言和，但须中国反俄随日。”^⑧待到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谈话后，连蒋介石也感到意外：“倭外务省发言，以其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蒋政权之意。此或其欲转圜自圆其说之意乎？危哉。”^⑨不过，宇垣一成发起的对国民政府方面的

秘密接洽，主要是以孔祥熙为对象的。孔祥熙曾分别安排僚属在上海与香港与日方人士洽晤，但事后把有关情况向蒋介石报告。^⑩蒋介石即“嘱孔不可另自接洽”，认为“对倭事亟须统一。”^⑪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彻底否定了孔祥熙主持的对日接洽活动：“庸之对敌工作，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⑫并且决定“严禁一切公私人员与倭人交接，否则即作私通敌军，以汉奸论罪”。^⑬

当时蒋介石否定高宗武的访日报告和孔祥熙方面与日本的接洽，不仅是由于日本方面明确表示了反对蒋介石、拟以汪精卫为交涉对手的态度。从军事上看，还在于日本步步进逼，武汉态势日趋严峻。从6月下旬到7月初，日军接连攻占了马当、彭泽、湖口。中国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应对部署。由于武汉三镇无险可守，军事委员会于7月11日颁布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将国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外围地区，尤其是将兵力重点置于长江南北之第五、第九战区，希望通过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泊施行战略持久战，“消耗敌人，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⑭大战在即，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不可对实现可以接受的和议抱有幻想。他在日记中写到：“倭寇以后对和战之动向，彼必恼羞成怒，舍和求战乎？”^⑮在对各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1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2日。

③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5日：“四时卅分偕宗武同谒委员长。五时卅分归胭脂坪，宗武谈至六时后始去。”《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83页。周佛海同日亦记：“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32页。

④ 《陈布雷日记》，1938年6月6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283页。

⑤ 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2005年12月31日），第25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2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5日。同日周佛海日记载：“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见于《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48-149页。

⑧ 《翁文灏日记》，第240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9日。

⑩ 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第24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23日。

⑫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12日。

⑬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0日。

⑭ 《抗日战史》（第五册）华中地区作战（上），（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92年版，第30页。

⑮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1日。

种情况进行了研判后,他认为:“此时应研究抗战到底,而不可稍作和平之望也。”^①根据蒋的日记,当时日方甚至直接派人与重庆方面接触,但蒋的立场颇为坚定:“倭寇一面声明重申其一月十六日申明有效,非蒋下野不可,而一面又多方派人来探条件通消息求和,此种卑劣状态几无国格可言矣。”^②“此时莫望敌来言和,应专心作打击敌军之准备。”^③“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可言和乃可使倭寇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④“敌将以武汉未陷之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⑤

对于守卫武汉、击退日军来犯的前景,蒋介石也有不少的考虑。

一方面,蒋介石对于军事上能否抗击日军对于武汉的进犯抱有信心,亦有相当的决心。“彼若冒大险以进攻武汉,以敌情与敌力而论,不难被我击破,转危为安,最后胜利之机,其在是乎?”^⑥“敌军战略展开并未发现,本月十五日之前未见敌军之积极行动,则其进攻武汉之企图已受顿挫乎?”^⑦“敌之进攻武汉企图似已遭受顿挫之势,应特注重。”^⑧蒋介石还看到了中国军队坚守武汉具有战局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为此,他甚至考虑到了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兵力与武器之准备。”^⑨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⑩在决心军事上守卫武汉的同时,蒋介石已经在构想“五年抗战计划之原则 甲、根据地;乙、经济改造;丙、政治改造;丁、党与军之改造;戊、教育与社会改造;己、实行三民主义。”^⑪也就是说,无论武汉会战结局如何,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作战,军事之外诸方面的改造与进步,对于支撑抗日战争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方面,在武汉会战期间,由日本军部主导的“萧振瀛工作”即直接对象针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谋和活动,也在若暗若明的推进。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日方派出的代表和知鹰二,与何应钦的代表萧振瀛,在香港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会谈,即9月25—26日,10月15—20日。^⑫而蒋介石在8月下旬的日记中便提到:“和知来牒之应

付方针。”^⑬“和知应拒绝。……与季宽谈对敌来意之研究。”^⑭可以认为,自“萧振瀛工作”的起始阶段起,蒋介石便密切关注,同时也知会过汪精卫。待到1938年9月中下旬德国与英国、法国在捷克问题上达成妥协,欧洲局势的暂时平静,曾使得蒋介石对于武汉这一华中大都市能否免于了一场血战,乃至中日之间能否实现议和、如何实现议和,又有所考虑了。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9月23日他还写到“对倭来求和条件绝对拒绝,其军事协定而以不提第三国保证为其旋回余地,以捷克近情英法无力保证可做殷鉴也。”然而接下来几天里,蒋在日记中多次谈到对于议和的企望:“敌军攻势之顿挫内容,廿五日以前不能攻陷汉口,彼或以欧局关系攻汉企图之受影响乎?”^⑮“若欧战不起则可和当和。”^⑯“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⑰他甚至考虑到了“停战撤兵之要点”,包括六个方面:“甲、分区交代;乙、交接时期,地方治安维持方法;丙、交接时防止误会与冲突之手段;丁、察绥问题之预防;戊、冀东问题;己、伪组织之处置。”^⑱这份“停战撤兵之要点”成为10月初开始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会谈的中方“腹案大纲”的基本内容。^⑲至于此时议和,是否实质为投降,蒋介石没有正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寄望得到上帝的启示:“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2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8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19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3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5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30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12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14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5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6日。

⑪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0日。

⑫ 邵铭煌:《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8年印行,第215页。

⑬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5日。

⑭ 《蒋介石日记》,1938年8月26日。

⑮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0日。

⑯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0日。

⑰ 《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10日。

⑱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日。

⑲ 邵铭煌:《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0页。

亦已到,凡人能为之事已尽其在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静听上帝之天命,以完成上帝之使命。”而同日的日记里,记有“对庸兄复电,先问对方之具体办法。”^①可以认为,此时是“萧振瀛工作”与“孔祥熙工作”的交集之时。在以后几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反复谈到了对日方“求和”的看法,如:“和知约八日回信之用意。”^②“敌百武要求我响应其和平宣言,以我为取消其一一六宣言旋转之余地,可知其求和之急与切也。……敌既欲求和而又延稽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动而已。”^③“注意:一、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二、应与其限期;三、警告其反宣传;四、绝对拒绝之件;五、不可约期限;六、和平之门始终未闭。”^④“四强调解中倭战争之消息。对敌和约之研究与宣言稿之修改。”^⑤“对倭战略与政略,自觉胜算可操也。”^⑥总之,在日军发起对武汉的最后进攻前夕,对于日方的诱和试探,蒋介石没有绝然否定,他仍然盼望出现和平,虽然他不赞成、也没有向日方乞和。

但是,蒋介石的希望很快破灭了。10月中旬,日军调动两个师团从广东省大亚湾登陆,10天后即进占广州。10月13日即日军登陆广东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有较多的篇幅谈到军事部署与相应的考虑:“倭在粤登陆,我军在武汉附近之战线应重新部署。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之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注意:一、敌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二、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三、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蒋继续写到:“若敌不在粤登陆,则胜不可为也,今敌既在粤登陆,是胜可为也,只要我人不被敌威胁而已。……本日决定转移兵力及部署甚觉从容裕如,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渺。”必须指出的是,蒋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分别写到:“电萧取消谅解条款”、“电萧烧毁原稿。”^⑦这可以说明,正是日军的军事进犯戳破了日方的诱和骗局,使得蒋介石彻底抛弃了议和之念,虽然形式上“萧振瀛工作”还在进行中。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弥漫,在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⑧在以汪精卫代表的“低调”集团看来,“除共党外,一般人心里几乎全部望和,……惟日本既不能取消一月十六日声明;蒋先生又不能、且不可下野,和将从何谈起?”^⑨他们以“不求谅于天下,自必见谅于后世”自诩,^⑩由此“出走”即走上民族投降主义的不归之途。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对和议前景不再抱幻想,并从军事失利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坚守了抗日的立场。

当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之际,10月24日,在重庆的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对于和战问题发生了争执。据王世杰日记所载:“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均倾向于和平,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余谓政府欲祛一般人对于抗战前途之疑惧,当向参政会提出一个比较切实的继续抗战计画,空洞的主张不足以镇定人心。”^⑪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据唐纵日记记载,10月28日“孔院长有一电来,似与日人有和议接洽模样。英大使来湘,与此事似亦有关。”^⑫蒋介石在湖南前线致电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征询今后方针,闻孙哲生电复主战,并主接收共产党所提意见,以加紧团结;汪精卫先生主张设法请英德出任调停,陈果夫亦然。”^⑬蒋介石本人则认为,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0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2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3、14日。

⑧ 《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6日,《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87页。

⑨ 《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9日,《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88页。

⑩ 《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8日,《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193页。

⑪ 《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24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10页。

⑫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⑬ 《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3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16页。

中国到了对日宣战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则写道：“对敌宣战之利害，此时海口全被封锁，吾国已无顾忌，若我宣战，美国应实施中立法，乃可断敌军向美购油、钢之路，实于我为有利。”^①此后抗战建国必须从新做起，彻底检讨过去之缺点与将来之改革。”^②他还致电张群“属参政会讨论宣战案”^③、“宣传宣战事”。^④10月31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明申政府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并号召全国同胞抱定“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争取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解放。^⑤次日，他还指示陈布雷：“告国民书可即发外电，使敌知我抗战到底之决意也。”^⑥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声明，国民参政会反响热烈。据王世杰记载：“蒋先生发表告国民书，主张继续抗战。国民参政会于本日通过决议，拥护蒋先生继续抗战之表示。在讨论前，共产党陈绍禹等提出一案，拥护蒋先生继续抗战之宣言，并指斥一切言和者为国贼汉奸。陈嘉庚来电亦有同样词句。会场中颇有纷扰。”^⑦翁文灏在其日记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国民参政会开会，余为经济工作报告，讲二时有余。该会通过议决案，拥护蒋告国民书，持久、全面、主动的继续抵抗。”^⑧蒋介石表明坚定立场和国民参政会的拥护决议，对于及时稳定军心民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在国民党高层，蒋介石的表态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疑虑、动摇甚至公开主和者，不乏其人。对此，据翁文灏日记有较多的记载：

(11月4日)“孔宅谈话，闻日本首相近卫(明治节)广播词内言，日本愿消灭蒋政权下之反日共产力量，不拒与建立东亚和平之国府和平。陈立夫、蒋雨岩(作宾)等皆主中国亦应有所表示，请孔发言。孔嘱魏伯聪(道明)、蒋廷黻起草，实系由廷黻起草。”^⑨

(11月11日)“胡适来佳电言，和比战更难百倍，除苦撑待变，别无路走，国际形势正好转，密呈汪、孔诸位，须立定脚跟。汪言，盼美、英、法有决心，或迫日言和，满足中国，或迫华迁就日方，或如英对捷克问题，由第三者定办法，迫中日照行，要

以美、英、法能切实表示决心为必需条件，美不必引苏联为同调。孔言，日方私自表示和平条件，亦不恶，但中方切盼美作切实调停，庶较可信。”^⑩

(11月12日)“复胡适之文电，告以汪、孔对和战意见，孔仍力主和。”^⑪

(11月15日)“孔宅晚餐。孔谈，蒋在长沙见英大使时，切询英对远东问题真正方针。”^⑫

(12月2日)“孔宅晚餐谈话，多数主速和，孔及陈立夫尤力。”^⑬

张嘉璈的日记记述得较为含蓄：“行政院开会，曾讨论及今后大局，毫无结果。”^⑭但后来与蒋介石谈话时却坦告了实情，蒋日记写道：“见公权，知政府中人仍对抗战全局多作悲观者。此种心理当急改正，勿使其滋蔓也。”^⑮

王世杰的日记也印证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和战主张：“今日杭君立武为予言，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⑯他还记述了蒋介石、孔祥熙和汪精卫三人一起商议时局的情况：“今(12月9日)午由重庆渡江往江南岸黄山晤蒋先生。蒋先生对继续抗战方针持之极坚。孔庸之在座，仍表示和议亦当考虑，并以敌人由桂攻黔为可惧为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8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6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2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0日。

⑤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10月3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第301-306页。

⑥ 《陈布雷日记》，1938年11月1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312页。

⑦ 《王世杰日记》，1938年11月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16页。

⑧ 《翁文灏日记》，1938年11月1日，《翁文灏日记》，第280页。

⑨ 《翁文灏日记》，1938年11月4日，《翁文灏日记》，第281页。

⑩ 《翁文灏日记》，1938年11月11日，《翁文灏日记》，第282页。

⑪ 《翁文灏日记》，1938年11月12日，《翁文灏日记》，第283页。

⑫ 《翁文灏日记》，1938年11月15日，《翁文灏日记》，第284页。

⑬ 《翁文灏日记》，1938年12月2日，《翁文灏日记》，第288页。

⑭ 《张嘉璈日记》，1938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日记手稿。

⑮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28日。

⑯ 《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40页。

言。蒋先生坚称半年内不可稍涉犹豫，与日人谈妥，惟政府对于后方政治、经济建设应立即确定一年半或两年计划。汪先生在座，询问我们将认何项条件为媾和条件，蒋先生答对外表示，当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情形为条件，惟措词仍当慎重。”^①陈布雷对于该日会务的情况记述较略：“餐毕谈党务、外交及今后抗战要务。汪、孔、朱、王均有意见陈述，委员长综合解答甚详。”^②而蒋介石本人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他还考虑了正式确立大本营的建制：“大本营名称建立对敌利害之作用如何。若大本营成立可带宣战性质，则使敌知所戒惧。”^③而10天前蒋在日记中提到“发表东北各主席”^④，则表明他对于中日停战议和的最低条件，已经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考虑到收复东北了。另外，蒋介石还向美国驻华大使表示了希望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的愿望：“本日与美使谈话，嘱转其总统之意：甲、中倭战事非美总统出面而作公平之调解，中国决不言和；乙、中倭能否得公道之和平，全视美总统能否负责尽职，以此为其责任与职业也；丙、中国必争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之一国，期与美国共任世界和平之责也；丁、余深信在其任内必能由其解决中倭两国战争协助我中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也。”^⑤应当说，蒋介石此时所提出的美国出面调解，已经不是接受日方条件的求和，而是希望美国政府出面向日本施加压力，促使其停止野蛮的侵华战争。

王世杰本人在会见国际人士时，也表示出了反对求和的立场：“今晚晤汇丰银行顾问 CasseHs 氏，彼主张国民政府向日表示愿和，似代表英国在华商人最近意见。彼意我国法币已入极端危险状态，趁此时或尚能挽救，迟则无及。余告以中国如向敌人请和，则无论敌人之条件如何，结果便只有接受之一法，因一经表示求和，则吾军政领袖将无法督导军队继续抗战；至于货币问题，只要英美略一援手，给我一二万万美金之借款，即可继续维持至少一年以上。”^⑥

在此，还须补充一下武汉失陷前后胡适的和战态度。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约半年的时间里，

胡适与周佛海等“低调”分子走得很近，曾数度表示主和立场，甚至上书蒋介石，敦促主动谋和。然而，自1937年底受国民政府委派赴美争取国际舆论同情支持，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这一转变在该时期胡适的日记中颇多记述。试举两例：

在1938年8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廷黻前有信来，其意似欲令孔肩负和议。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长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百倍。欧战时，威尔逊谋调解，三年不成，而参战反易做到，可为明鉴。西班牙事也是和比战难。适信苏、美两国均不欲我议和。英人虽有调解，亦决不敢提。英首相廿六日明说英政府不能独立调解，可证。故我惟有咬牙苦撑。”^⑦

11月8日，胡适收到翁文灏的来电并即致复电：“晚上咏霓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拟长电答咏霓，致介公，又致复初。复初今早来电，甚使我安慰。”^⑧11月12日，胡适记述了收到翁文灏回电的内容：“回寓时已十二点四十五，建文给我一电，写着‘亲译’，是咏霓来的文电。我译出全文，已二点多钟了。是答我的佳电，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文中有使我甚着急之消息，故译完后，我拟长电复他。”^⑨

11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述了复翁文灏电的基本观点：“复咏霓文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⑩

以后，在汪精卫出走后，胡适曾致电汪等“勿公开主和”。正如与胡适颇为熟识的王世杰在日

① 《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9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44—445页。

② 《陈布雷日记》，1938年12月9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319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29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1日。

⑥ 《王世杰日记》，1938年11月30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38—439页。

⑦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⑧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186页。

⑨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187页。

⑩ 《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188页。

记中评议到：“适之在开战前极力反对战事，近一年来则力主‘苦撑’，反对妥协。”^①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在此前后，汪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先后潜离大后方，与汪精卫会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呼应近卫声明的“艳电”。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高层的相关立场很快取得一致，即坚决驳斥日本方面的种种谬论，严厉谴责汪精卫的行径。

蒋介石于12月26日发表演讲。据陈布雷日记记载：“出席纪念周。总裁亲临训话，对近卫廿二日声明阐述甚详。指示抗战到底，绝不妥协屈服，乃可免于危亡之至理，并报告汪先生离渝养病之真相，历一小时卅分始毕。”^②王世杰同一天的日记写道：“今晨中央党部举行纪念周时，蒋先生声明两点：一、近卫最近谈话之不合理，国民政府无与日本媾和之意；二、汪先生出国系养病，无政治意味，尤无如外间所传代表军委会或政府与日人议和之使命。”^③王世杰还记载了重庆方面对于汪精卫“艳电”的反应：“今日午后中央及蒋先生接到汪先生二十九日通电，主张以近卫本月二十二日声明为商洽和平之根据。电文共分三点：第一点认近卫声明系以善邻友好旨，不要求中国割地或赔款；第二点认近卫之所谓中日共同防共，并无干涉中国军事或政治之条件；第三点认为近卫所言之经济提携系以平等为原则。党中同志闻此电后，甚激昂，因汪先生此电已在香港公开发表。”^④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集中央执委委员谈话会，讨论汪精卫“艳电”事，蒋介石担任主席。根据王世杰记载：“开会后旋即声明改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会议时张继、覃振、吴敬恒、孙科、方觉慧、狄膺、焦易堂、刘文岛、冯玉祥、邹鲁诸委员及林主席，均主张执行党纪开除党籍，或更通缉以彰国法，孔庸之委员主张设法令其赴欧。蒋先生谓拟先以私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决议予以警告；对于通缉则语为无意义。讨论历两小时余。但发言者仍主张开除党籍。于是蒋先生以举手法征询大家意见，于是到会六十八人，举手者六十四人。”王世杰还把表决的结果与国民党的对日和战立场联系在一起：“汪先生事，如不召开会议，则蒋先生处置之法尽有多种。现经召集会议则在一般人心目中，问题的中心，便是和或战；至少在党内无数党员，党

外的共产党人，前敌的将士，将由此以断定本党对于和战问题是否一致。假使当时不通过请求制裁者之提议（或通过而有不少的反对票），外间必认本党内部显有主战、主和两大派，其影响极大。今日在会议时，大家对于汪先生之攻击，实多不实不尽之词与泄怨之语，惟即经召集会议，则为中央抗战国策之稳定计，只好接受执行党纪者之请求。”^⑤翁文灏日记记载：“汪精卫自港发艳电（上月廿九日），主张近卫十二月廿二日所言调整中日关系，中国应接受议和。今日，中央议决除籍、撤职，以蒋十二月廿六日所言为唯一标准。”^⑥蒋介石本人也有如下记载：“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幸也。”^⑦稍后，蒋介石在日记中重新提出了中日实现和平的条件：“和平条件：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根据可言，或余地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⑧他并且进一步说明：“汪已向倭直接公开求和，中央更应坚持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也。”^⑨显然，这个时候蒋介石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已经是昭示抗战的立场，即中国期盼和平，但决不乞求和平；只要上述条件不满足，中国决不停止抗战。虽然以后重庆方面仍与日本方面有过一些接触，国民党高层内部对于如何真正实现全面抗战、全民族的抗战，如何遏制与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依然有着分歧甚至矛盾；但是就整体而言，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能不能向侵略者求和的问题，毕竟已经基本解决。

① 《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4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6页。

② 《陈布雷日记》，1938年12月26日，《陈布雷日记》第二册，第322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26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59—460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3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63—464页。

⑤ 《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第438—439页。

⑥ 《翁文灏日记》，1939年1月1日，《翁文灏日记》，第298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9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3日。

在历史研究中,要做到尊重历史并不容易,要理解历史更难。本文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结合其他名人日记和其他史料,梳理了自陶德曼调停失败至汪精卫出走近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笔者认为,蒋介石日记及其他名人日记,并没有改变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叙事和主要评价,但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抗日战争第二个年头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评估正面战场的进退得失,特别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对日和战问题的。进入1938年之后,国联和西方大国在制止日本侵华方面无所作为,中国方面不仅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这一最低要求变得渺渺无期,又遭遇了徐州和武汉两大战役的失利,正面战场战线不得不大幅度西移。“以此情势,而言继续抗战,长期战争,论者每现悲观。瞻念前途,自力更生有益趋黯淡之势。”^①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压力之大,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的曲折反复,是时人更是后人难以具

体想见的。尤其是蒋介石本人,虽然其内心有过对战局的消极看法,有过对外来调停的期盼,也有过对在最低限度条件下实现停战的向往,知晓甚至掌控对日秘密接触;但是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无疑也最大,在引领国民党高层在对日和战问题上达成共识、作出决策的过程中颇为不易。从根本上来看,蒋介石最终坚持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基本立场,保证了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阵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某些国民党高层人士的畏战、乞和立场以及彷徨、避责的心态相比,尤其是与“低调”始而“出走”终的汪精卫集团相比,其高下和是非,还是很清楚的。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蒋梅]

① 《王子壮日记》,1938年11月5日,《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四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570—571页。

(上接第86页)安所得登诸政枢之地,以展其才乎。……”^①

袁这封信所隐含的逻辑是,宋案的幕后主使已经很明显了,是谁呢?“世凯既无所用其袒护,亦不必代为辩明”,即袁周围的人;接下来具体到“今之从政诸君”,不能令人满意,对应章信中之“宵人”;接下来进一步具体,“约法同意权”一词把矛头指向国务员;是国务员中的哪些人呢?“然一有辞职,即旷数月而不能通过,一有否决,即其人向著名誉,亦即蹶不可复振”,这说的是国务总理。因此,袁之意指甚明,即宋案主使是赵秉钧。

袁、赵二人之所以互相推卸责任,袁之所以试图把罪名赖给赵,应该能反映出—个事实,即袁虽有谋宋之意,但自始至终没有下达过明确的刺宋命令,赵秉钧对此事的参与是一种有限的参与,即他对其中的若干环节并不知情;^②真实的情况应当是,袁世凯作为幕后的总策划人,处处留“情”,

多方设“意”,并把整个事件的运行分割为若干互不统属的部分、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身处局中的执行者不一定明了事情的全貌),最终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事的发生。

[朱怀远: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戚如高]

① 《覆章太炎论政见》,《袁大总统书牋汇编》卷七,第4页。

② 洪述祖虽只是内务部秘书,但他可直接听命于袁,也可越过赵直接向袁请示。时任国务院庶务秘书的程经世曾对人言,洪秘书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程转过数次(宋案未出时,程自言。宋案出后,程畏祸避至青岛)。另据王志馨云:“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参见张国淦:《北洋述闻》,第49页。由此可见,洪与袁的关系决非寻常行政上下级间那样简单。